



“欧洲和东亚的二战记忆”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莹莹

长期以来,德国作为对二战历史彻底反省的典范,一直被中国推崇。那么,德国的具体反省历程是怎样的?哪些经验应该借鉴?我们的了解其实还不够。奥地利在1938年被德国吞并,成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它如何看待自己在二战中充当的角色?是加害者?受害者?还是兼而有之?近几年奥地利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回看东亚,中日、日韩一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争执不下,是不是应该走出东亚,了解西方特别是德国、奥地利的战争记忆和反省,与欧洲学者一道进行思考?为此,2017年8月30—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著名汉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共同筹划,联合奥地利科学院、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欧洲和东亚的二战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以期欧亚双方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魏格林教授作为奥地利筹办方的代表,进行了细致周到的准备,安排了除她本人以外的两位德国学者:自由记者吴福钢(Wolfgang M. Schwiedrzik)和德国乔治·艾科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前副所长法尔克·平厄尔(Falk Pingel)参加。还邀请了一位奥地利学者:奥地利科学院现当代史学者海德玛丽·乌尔(Heidemarie Uhl)讲师、萨尔茨堡大学宗教学者弗朗茨·格迈纳-潘策(Franz Gmainer-Pranzl)教授、奥地利科学院历史学者阿诺德·苏潘(Arnold Suppan)院士与会。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邀请了以下学者与会:三位日本学者(信州大学久保亨、广岛大学水羽信男、山形大学吉井文美),两位韩国学者(韩京大学尹辉铎、成均馆大学金志勋),两位牛津大学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聂洪萍。中国有复旦大学吴景平、上海交通大学程兆奇、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南京大学张生、西南大学潘洵、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南开大学三人(宋志勇、江沛、李金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三人(黄道炫、高士华、高莹莹)共12位学者与会。此外,魏格林教授还代表奥地利主办方特意出资邀请了两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姜涛、郭妍)参会交流。

关于二战的战后记忆问题,欧洲和东亚所讨论的内容有其不同之处,但有一种观点至今仍旧占据主流,即德国的反省好于日本,这是一个过于笼统的印象。魏格林在开幕式致辞中介绍了德国学者近年的研究成果,认为德国的战争反省其实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方面甚至出现过反复。高士华在开幕式上强调了中、日、韩学者走出东亚,与欧洲学者交流的重要性。

苏潘及米特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和主题演讲中注意到中国在二战的作用。苏潘指出现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1937年战争已经在东亚爆发。米特曾著有《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①,他的此次演讲《一个被忘记的同盟者?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以及它对理解二战政治、社会全球史的重要性》再次强调,如果1937年中

① 拉纳·米特著,蒋永强等译:《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



国就投降,则会对整个二战的走向,对印度、东亚都产生重要影响。他引用蒋廷黻的演讲,认为二战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帝国在亚洲空间的争夺,国共没有选择汪精卫路线,而是选择继续抗战,意义深远。对此,吴景平指出,在强调中国二战作用被忽视的同时需要注意,对于不同的国家,中国的作用是不同的,记忆因此就存在不同,这也是美国与欧洲国家对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看法有异的原因。

此次会议共分七场。

一、欧洲与东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问题。第一场是对欧洲与东亚有关二战记忆问题的宏观性讨论。高士华对中国抗战记忆的地域性差异和创伤记忆大大高于抵抗记忆问题进行了分析;潘洵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大轰炸”在战中战后的记忆演变及建构。苏潘选择了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对二战纪念的差异进行分析。他认为家庭的传承使战争记忆延续下来,但由于在二战中不同经历及战后对战争反省的不同态度,欧洲人民虽然曾经拥有一段共同的历史,却没有拥有共同的记忆。乌尔把欧洲的二战记忆分为三个阶段:1. 冷战结束期间、2. 二十世纪末、3. 现在。这三个阶段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问题上。冷战期间,除德国以外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强调自己在战争中的受害角色以及对纳粹的反抗。在这种气氛下,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淡出了大部分欧洲人民的历史记忆。二十世纪末,以普遍人权为基础的,超越国家超越欧洲甚至是全球的历史记忆的概念开始出现,欧洲国家在“追求记忆”的文化活动中,开始重视是否承认自己曾经跟纳粹政权合作过,尤其是是否参与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于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被称作“史无前例、独一无二”,成为全世界记忆文化的焦点。随着东欧八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在2004年加入欧盟,这些国家在苏联影响下所发生的对于持不同意见者的态度成为欧盟历史政治与记忆文化讨论的一个重点。

魏格林对冷战结束后历史书写中表现出的断裂性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总会引起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克服这种不安全感的办法是在历史中寻找答案。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对历史的重写所产生出来的历史叙述本身就是断裂的。历史的叙述不能产生出社会与个人的认同感。她分别以东亚和欧洲为例,概括介绍了各自在历史叙述中存在的断裂性特征。她认为,冷战后的历史意识向敌对主义和非敌对主义两个方向发展,这不仅取决于社会内部的因素,更取决于地缘政治,而当前欧洲和东亚国际关系紧张正是历史意识政治化的主要因素。

二、中日学者对二战的看法。第二场的三位学者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久保亨对中日战争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由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及消息来源,中日两国民众都强调自身的受害方面。战后,中国通过对各地区战争创伤的发掘,使战争记忆得以传承,而日本在20世纪60—80年代出版的战争记忆的书籍则大多强调对阵亡士兵的纪念以及对世界和平的祈祷,以至于日本民众时至今日依然加害者意识薄弱。久保亨最后呼吁,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冰释前嫌对两国关系的改善至关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日中两国人民分别克服以各自国家为中心的中日战争观。

韩东育以沟口雄三、竹内好等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之心的日本著名中国学专家为例,认为战后学界无论左翼或右翼知识分子,在研究中日战争时存在利用“近代文明”之“善”来消解对外侵略之“恶”的学术手法,即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换“加害”、以“定量”否决“定性”。水羽信男考察了西南联合大学等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战时国际形势的认识,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认识国际形势的主要工具是新兴的地缘政治学,虽然其认识存在偏颇,但这种态度值得肯定。

三、战后欧洲和东亚的战争纪念。第三场的五位学者主要讨论的是战后欧洲和东亚三国在战争纪念方面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尹辉铎概述了2001年以来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和普通市民共同编写三国通用历史读本,以建立对历史问题共同认识的过程与现状。在东亚三国为历史和解不懈努力的同时,为什么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和民众感情却向冲突和对立的方向发展?根源何在?他承认在编写共同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三国学者在战争记忆和认识问题上分歧巨大,而这是直接影响讲授和学习二战史的重要因素,需要中日韩三国在今后继续探讨。

金志勋以纪念馆为考察对象,分析了东亚各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问题。他认为,相较于个人,“国家的记忆和忘却并非单纯的一个过程,而是与政治利害关系有着密切关联的。统治者们试图通过对过去事实进行歪曲、捏造、隐蔽记忆而谋取自身历史的正当性。同时,也强求民众忘记不希望被记住的历史真实”。他认为,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促使中国和韩国开始建造铭记抗日战争和遭受压迫与被害的记忆空间,而这种空间并不是寻求真正的和解和共存,反而助长了集体对立意识。日本右翼和部分保守势力的行为提供了强化这种对立意识的理由。

平厄尔介绍了奥地利陆军历史博物馆、德国军队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柏林德俄博物馆、日本靖国神社中的游就馆、广岛和平纪念馆、波兰格但斯克博物馆以及一些西方教科书中有关战争的展示与描写。他指出传统的展览方法习惯于展示武器、战争的现在与过去,但现在保护和平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目标以后,有关战争的描写会特别突出受害者和战争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目前欧洲的军事展览馆中善于用建筑和设计的方法创造间断性,以表示与过去决裂,或以视听方式记录下战争带来的痛苦。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博物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采用新型科技进行展览,后者也增加了对受难者个人化的描写。柏林的德俄博物馆突破了敌对观点,是德俄两国合作并在展出设计上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谈到日本对二战的纪念上,他认为日本目前体现在展览方面的战争记忆是分裂的。一方面,靖国神社的游就馆属于传统的武器博物馆,把对死亡者的纪念与对英雄的崇拜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为战争辩护的态度;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性场所和私人办的展览馆多表达对和平的普遍追求,并纪念非日本人受害者。

聂洪萍讨论的是当今中国在抗战历史叙述中多样的传承工具,她认为传承路径的多样性,使抗战研究从范式变成了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历史叙述。

宋志勇认为纽伦堡和东京两次审判背负了法律与政治双重责任,确立了侵略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概念。但是,德国和日本却因两国社会对这两次审判不同的认知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在民族和解方面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他认为这一结果与权力者操纵国家记忆有关,导致人们仅仅获得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表象,而掩盖了日本战争加害者的事实。

四、欧洲的战争记忆。第四场的两位学者介绍了欧洲的战争记忆问题。潘策从宗教学的角度探讨了以追求完美生活为目标的宗教与战争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宗教本身即是一种记忆,充满跟记忆有关的仪式与思考。他引用约翰·巴特斯特·梅兹(Johann Baptist Metz)的记忆宗教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宗教是以受苦的经验为中心的记忆。

吴福钢高度评价1946年德国人的主动自我净化行动,认为自我净化就是自我反省,自行面对过去的历史。他以德国作家和历史学家利卡达胡赫(Ricarda Huch)为例,高度评价了希特勒统治时期参与抵抗的人的功绩。面对战争罪责,他认为要正视,“只有认罪才能产生团结感与责任感,而这是自由的必备条件”。

五、关于南京大屠杀。第五场讨论的主要是南京大屠杀。程兆奇从历史记忆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南京大屠杀逐渐形成的不同记忆、南京大屠杀早期的不同记忆、南京大屠杀不同记忆四个方面,剖析了中国、日本、欧美国家在事件发生当时以及日后对南京大屠杀叙述产生的差异。张生受





法国学者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空间与政治》^①研究的启发,把南京大屠杀看作是日军突破原定作战目标人为制造出来的特殊空间中生产出来的事件,其讨论的目的是在特定空间范畴里探讨南京大屠杀这一特定历史事件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侧面和意义。

张连红利用有限的资料,梳理了南京安全区建立者中一位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机械师哈茨(Rupert R. Hatz),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保护南京市民所做的贡献。他认为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中,超越民族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值得今日史学家不断挖掘、广泛传播和怀念。

六、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第六场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

在沦陷区研究中,汉奸问题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研究领域。江沛利用一部比较少见的伪满军官的日记,近距离审视东北沦陷时期中国的对日“合作者”群体,以探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民众的复杂心态。

郭妍对目前中外史学界研究沦陷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沦陷区的经济、教育、日军暴行研究较为丰富,而传统的政治、军事研究相对较少,社会、文化研究更为薄弱。

黄道炫讨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在面对外族入侵的救亡时刻,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促成了中国民族意识勃发,但如果没有强大而又持久的抵抗,在与日军的对垒中,民族意识仍然很难敌得过现实生存的消磨。

七、战争与社会。第七场的四位学者讨论的是战争爆发后地方社会与民众的反应。吴景平利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和钱业公会档案,梳理了在国民政府势力退出上海之后,上海金融界同业组织和头面人物,代表华商银钱业,围绕市场秩序的重构,与日伪当局之间进行的折冲博弈。他指出,在这种交涉中既有抗争,也存在妥协、退让乃至合作。

姜涛梳理了1942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对美军事合作交涉的过程,他认为对这一交涉过程的分析要建立在客观的史实重构上,既不能忽视国民政府的主动性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同时亦不能陷入“歧视”与“反歧视”的叙述框架中而不能自拔。

李金铮以亲历抗战的五位中国著名知识精英蔡元培、竺可桢、吴宓、顾颉刚、夏鼐为例,通过对其日记的梳理,分析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反应。

吉井文美以日本长野县下伊那郡河野村的村长胡桃泽盛为例,通过对其日记的梳理,探讨居住在日本山区的农民是如何从自己的生活层面看待、感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

通过两天的讨论,与会学者对东西方在战争记忆问题方面的现状及差异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不同的战争经历、第三者的立场使东方或者西方的学者在观察他国的战争记忆时比较容易超越民族及个人的感情,获得相对客观的历史认知,并给予对方以启迪。

魏格林注意到韩国和中国的学者普遍认为日本学者应该接受只有通过原子弹爆炸才能结束战争的结论,她对此提出质疑,并指出在中日韩共同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这一类的分歧。同时作为一名关注现实的学者,她强调,现在从历史上寻找答案的人少了,学术研究应该更多关注社会舆论,关注人们从何处寻找答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知识的作用。

[作者高莹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亨利·勒菲弗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